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学术支持: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第 239 期 (总第 345 期) 2018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jx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经济学家

周报

编者按

瑞士当地时间 1 月 25

日,腾讯新闻原子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达沃斯联合举办午宴。午宴以“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为主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午宴上作主题分享。

林毅夫说,到 2025 年,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今天我想谈谈这个话题,中国经济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其答案。自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四十年前,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的贫困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只有 155 美元,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数据还要低 1/3。但是从 1978 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 年到 2000 年间,中国 GDP 达到 9.5% 的年均增长速度,这样的速度持续了 39 年。如此短时间,一个人口庞大的贫穷国家取得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这在人类历史上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是罕见的。凭借这样的增长速度,去年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 9400 美元。也就是在这四十年,超过 7 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们展望未来,到 2025 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国民收入将达到 1.2 万美元。中国将成为二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国家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其他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2025 年的时候,中国将成为第三个。

现在回归主题,究竟什么驱动了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此有如下解释:首先,中国人民为自身生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绝对是动力之一。企业家为盈利而创建企业也是动力之一,中国政府在其任期内为繁荣做出的努力,无疑也是动力之一。这是我个人的解释。这些动力在 1978 年之前和之后都存在。这些动力不仅适用于中国,它们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

当我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去过了很多国家,去过非洲,那里的人们也有着同样意愿和渴望;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聪明才智,可以助力国家发展;那里的政府同样想促进国家的繁荣。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而是什么造就中国四十年间的迅猛发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援引一个我十分赞成的经济发展理论,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包括创新行业的科技创新,

如在美国和欧洲。有一点不同,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这些国家做先行者,开发新产品,创造新行业,这需要很多资金,风险也更大。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它们可以借鉴先行者科技创新的经验。产业升级方面也一样,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降低成本和风险,从而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战以后,世界上有三个经济体找到发展经济的秘密,取得 7% 以上的增长率,持续 25 年甚至更久。1978 年以后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中国的成就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后发优势十分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呢?当然,中国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中国很多产业已经站在世界前沿,比如腾讯公司。更深入的发展需要主动的创新和创造。中国的人均 GDP 是 9400 美元,而美国则是 60000 美元,这使得中国在未来不仅要以自主创新作为驱动力,同时也要依靠其他动力,那就是借鉴学习,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随。

因此,中国是有潜力加速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潜力有多大?怎么去衡量呢?我认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比较人均 GDP,因为人均 GDP 意味着一国平均的生产力和平均科技力量。2008 年时,中国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 21%,这个数字相当于 1951 年的日本、1967 年的新加坡、1975 年的中国台湾和 1977 年的韩国。这些都是东亚经济体,它们都取得连续 20 年的 8%—9% 的经济增长,弥补了科技上的差距以及收入差距。

根据这个分析,我认为从 2008 年开始,

中国取得 8% 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其他方面努力,比如国内的改革,同时需要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我认为,从现在到 2030 年,中国很有可能取得 6% 甚至更高增长率,这将凭借新产业的创新驱动和传统行业的产业升级。除此之外我还要提的是,中国更大的国际责任,是将要怎样助力世界发展。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也将继续为全球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将在 30% 以上,甚至更多。

对于我,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研究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动力,每个国家其实大同小异。人们都想生活得更好,所有企业家都想实现梦想,所有政府也都想创造繁荣。然而,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利用好它们的禀赋。我想这是核心所在。1978 年以前,中国有着同样的禀赋,当时的状况却差强人意。即使中国人民十分努力,但是到 1978 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三贫困的国家。

根据我的分析,繁荣的经济首先来自市场经济,其次是企业家精神,当然也离不开政府努力,变革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依靠这些因素,我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繁荣数十年。

我个人有幸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我的一些学生也成为世界银行的顾问。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目标和梦想就是在全球消除贫困。我认为,中国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可以运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消除贫困的梦想也将是指日可待。

金融稳定和发展都需要依靠金融改革开放

■ IMI 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王永利

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相应地也确定了新的思想,新的方略,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总体战略目标,由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其中,主要是需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转型调整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确保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特别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这样的重要战略目标。

新时代的提出,对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适应新的要求,我们怎么去建设新金融?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

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其工作基调还是稳中求进,个人的理解是稳中求进是一个综合体——既要稳,还要进,是在控制风险基础上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说稳是基础,进是追求,重在改革。其中,金融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金融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 2017 年的国家金融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九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要服务实体经济,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其实这就是通过金融的运作,把社会资源配置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创造出更大的财富,这也是金融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及其合理性之所在。金融之所以能够分享一部分的社会利润,是从新创造的财富里面去分,而不是只在现有财富中去瓜分,更不能把资源配置错了,不仅没有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反而损坏了现有的财富。这也是“好金融”和“坏金融”的重大分界。

大家一定要看到,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市场里面用本币计价和清算,这比我们走出去设置机构和引进来设置机构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三) 推动中国金融加快迈上新阶段新层级

金融发展包括了三个不断延伸和提升的层级。

第一,货币金融。主要是以货币的印制、投放、流通、清算等为主体功能的阶段,这是金融的初级阶段。我们知道货币是金融的基础和灵魂,金融是建立在货币的基础上,没有货币就没有金融,所以可以把这个阶段叫做货币金融阶段。

第二,资本金融。将货币转换为资金或者资本进行相对独立的融通,这也是我们讲金融主体的概念叫做资金融通,包括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可转换或者结构性的融资工具等。

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主体功能上升到资本的时候,可以叫做资本金融,是金融的成熟阶段。

第三,交易金融。将各种资产的权益或者现金流证券化,并通过其交易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和灵活配置,甚至达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这可叫做交易金融,是金融的高级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必须

注意的,那就是风险。风险是与货币金融相伴相生共同成长的,金融越发达,风险就越突出,风险管理的要求就会越高。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是金融实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要增强金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果风险识别、风险控制的能力达不到,那么其他的都是无用的。而且金融越向上发展,例如发展到交易金融的时候,其风险越复杂,可以瞬间爆发,甚至引起全球共振,必须有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金融在货币金融阶段,包括货币的总量和投放,特别是最近发展的移动支付,以及在资本金融方面,我们的资金融通,特别是间接融资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交易金融、金融监管、风险控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急需加快推动中国金融向交易金融去发展。

(四) 积极应用新科技,推动金融创新发展

新时代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的新时代。大家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血脉和资源配置的枢纽,金融运行的效率和风险控制的水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深刻的影响,必须运用各种相关的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促进自身的效率和发展。

IT 时代,金融在全社会里面还是相当领先的。在互联网新时代没有到来之前,金融领域的 IT 水平,大数据积累等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信息技术已经从 IT 时代进入到互联网的时代,进入一个互联网自己的新时代,随着宽带传输、移动互联、云存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推动互联网进入了万事万物互联、随时随地互联的新时代,互联互通、跨界融合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

例如,社会资源配置由原来主要以所有权为主导,变成了以使用权为主导。在今天你可能不用买,而是租。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获取成本,提高利用效率,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其中很多人没有理解到,互联网的发展未来五年、十年跟今天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想投互联网的技术平台,都想要去做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征信等,但是未来所有人都能做这样的事情吗?可能投不起,也维护不了,所以未来这种底层架构要由专业的人去做,做大数据可能也要由专业的人去做,其他人可以分享。

未来社会更多的是共享,是合作,是开放。这可能需要很多人要看清,现在可能聚焦什么都要做,但是也可能三五年什么都没有,同时大家要意识到需求、客户以及场景已成为商业竞争的基础和焦点。未来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客户群,没有应用的场景去黏住客户,想在互联网时代取得竞争的优势是很难的,而且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求方会越来越重要。

第三,交易金融。将各种资产的权益或者现金流证券化,并通过其交易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和灵活配置,甚至达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这可叫做交易金融,是金融的高级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必须

术、必须有利于降低成本、控制风险,促进社会资源更好的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创作出更多的价值或财富,并从中获取合理的收益,而不能仅仅为了自身获取更多的收益而损坏社会利益。P2P 也好,众筹也好,各种虚拟币也好,最后的结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对此我们要回味一下到底什么是金融?什么是货币?一定要搞清楚。

其次,随着互联网等信息科技迅速发展,要准确把握其发展方向和规律,特别是要掌握互联网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特点,未来大家不要想着什么东西自己做,大而全、小而全,是不符合互联网发展方向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再大的企业未来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去做是危险的,过度的垄断一定会遭到制裁。

在这些方面,要在准确把握本质的基础上切实加强新技术应用的监管,监管上还要跟上来。既要控制风险,也要鼓励创新,当前尤其对数字货币、区块链,包括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这样的一些热点问题要客观、理性的对待,要尽快找准其本源、本质。

金融科技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实验室、聚焦于资本运作,而是必须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区块链,如今热的不行,但不自觉的都是用比特币的模式在讲区块链,大家并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东西,比特币以区块链的技术作为支撑,人为建立了一个纯网络的环境,运行的是网络内生的一种资产——比特币的资产,所以一开始就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交易的完整性,用区块链的技术保证不出差错,所谓信任、价值的转移等等都能解决。但有没有想过用比特币这样一种纯封闭的系统,内生的价值资产的设计理念,能不能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其实是很难的。只有技术真正解决了现实的问题,技术才有价值,否则都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最后,适应新要求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其实也是前面的一个总结。金融稳定和发展都需要依靠金融改革开放,2018 年发展速度上要稳,改革开放要进,着力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开启新征程,建立新金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围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控制风险、切实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制定和实施好金融战略,其中尤其要强化国家金融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重点是加快推进金融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开放,推动金融加快向交易金融推进。

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按照同类业务归口管理,统一运行规则和监管标准,推动金融监管由以牌照和机构监管为主,转向业务和行为监管为主,划分职责,明确主体,理顺关系,增强监管的科学性、严密性、严肃性。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围绕“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建设,加快设计和推进配套的以人民币为主导的新型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深刻改革。